

儿童文学研究

ERTONG WENXUE YANJIU

第一辑



儿童文学研究

第一辑

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4.5 字数 117,000

1979年1月第1版 197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统一书号: R10024·3567 定价: 0.36元

儿童文学研究

第一辑目录

肃清流毒 解放思想 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尚 峭(1)

童话创作面临着重大的历史任务

——《童话选》序……………贺 宜(11)

试论动物故事……………陈伯吹(23)

大力反映儿童生活 大力塑造儿童形象……………李楚城(39)

儿童小说,还是神童小说?……………鲁 兵(49)

科学文艺漫笔……………叶永烈(54)

试谈科学幻想作品的特点……………鲁 克(68)

儿歌和儿歌创作……………吴 超(72)

关于儿童文学……………孙 犁(77)

鲜花献给周总理

——编辑《雾都报童》体会……………陆行良(82)

敢于创新 工于构思

——谈任溶溶的儿童诗《一个怪物和一个小学生》……水 飞(88)

情真意切

——读短篇小说集《母校留念》……………纪 民(92)

耐人寻味

——读童诗《字典公公家里的争吵》……………康志强(96)

确实令人捧腹的答卷

——评《一张考卷》……………晓 纪(98)

儿 歌 漫 谈	儿歌不“儿”可休矣·····	张继楼(100)
	儿歌贵短(外两则)·····	张秋生(101)
	有余不尽(外三则)·····	圣野(103)
	一片小小的雪花·····	田绿(107)

评长篇小说《钟声》

敲的是什么“钟”?·····上海市教育局 杨正军(110)

《钟声》评论会发言纪要·····本刊整理(114)

评中篇小说《金色的朝晖》

射向教育革命的毒箭·····刘德重(122)

小朝晖是块打人的石头·····上海前进小学 庄首源(125)

“阶级关系变动”论的丑恶图解

——评《朝霞》发表的小说《小伟造反》·····周晓(128)

安徒生和他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贺宜(131)

附: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

不灭的战绩

——记先驱者在儿童文学阵地上的战斗·····胡从经(136)

简 讯	◆◆◆◆◆	
	◆◆◆◆◆	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庐山召开·····(48)
	◆◆◆◆◆	共和中学评论毒草小说《钟声》·····(71)
	◆◆◆◆◆	上海作协、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举办儿童文学创作讲座·····(81)
◆◆◆◆◆	◆◆◆◆◆	上海市传达、贯彻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 精神,决心为少年儿童出版更多更好的读物·····(95)

编后·····(140)

肃清流毒 解放思想

繁荣儿童文学创作

尚 哨

在林彪和“四人帮”合伙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下，儿童文学这个小百花园满目荒凉。

建国十七年来，在党中央关怀和抚育下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被说成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修正主义”，人无好人，书皆“毒草”；而在“四人帮”控制下出笼的“触及时事”、“主题先行”的所谓作品，则无人过问，也无法卒读。这样就造成了严重的书荒，使我们两亿少年儿童处于长期的精神饥馑之中。

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大治文艺，儿童文学创作也得到了复苏，许多富有教育意义的题材，许多深为儿童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打破枷锁，撕去封条，开始出现绚丽多姿的局面。但是我们决不能低估“四人帮”的流毒，他们是抓文艺起家的，经营十年之久，流毒既深且广，或者使我们有些同志至今心有余悸，或者使我们有些同志在创作中久久未能摆脱其影响。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儿童文学创作在今天能有这样好的形势，就是两年多来同“四人帮”进行斗争得来的。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反动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揭批他们法西斯式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既反动又荒谬的文艺理论，肃清流毒，解放思想，这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的必要条件。

• 1 •

“四人帮”从他们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出发，从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出发，在文艺创作中炮制了“三突出”模式。这个模式简直使得儿童文学创作陷入绝境。按照这个模式，儿童小说中的主人公少年儿童就应当是“第一号英雄人物”，就必须是“高大完美”的，不仅要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会说出驳不倒的“真理”，而且能运筹帷幄，克敌制胜。这种天方夜谭式的英雄人物，其实不值半文钱，在实际生活中也是找不到的。林彪鼓吹“天才论”，“四人帮”在这里搞的是“神童论”。二者同出一辙。这样一来，有血有肉的儿童不好写了，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成长过程中的儿童也不好写了。象小兵张嘎这一类可爱的孩子，根本就被“三突出”开除了“儿童文学籍”。最可恶的是，“四人帮”颠倒是非标准，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把一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为推行“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而横行不法的人，奉为天字第一号英雄人物，把他们当作少年儿童的楷模。如果我们的接班人竟是这样一些人，那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要后继无人了。“四人帮”的“三突出”，不仅使儿童文学中的儿童千人一面，并且严重歪曲了新中国少年儿童的形象，在实际生活中造成恶劣的影响。

反映阶级斗争，对少年儿童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是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在十七年中是抓得较好的，出现了反映民主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龙潭波涛》、《小兵张嘎》、《我的弟弟小萝卜头》等和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刘文学》、《二十响的驳壳枪》等优秀作品。

“四人帮”一方面大喊大叫“写阶级斗争”，一方面把上述这些写阶级斗争的优秀作品打入冷宫，这在当时，许多同志觉得不可理解。现在清楚了，原来他们是以极“左”的面貌掩盖其极右的实质，是为了反对党的领导，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们颠倒了百分之五和百分之九十五的敌我关系，进而提出所谓“全面专政”，这就充分暴

露了他们作为地富反坏和反动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反动立场。他们将阶级斗争题材说成是唯一的题材，其他都被斥为“无冲突论”。其目的是为了将儿童文学纳入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为帮所用。

什么叫“无冲突论”？在他们看来，不写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自然是“无冲突论”；就是写矛盾而“不激化”、“不转化”，也是“无冲突论”；至于写好人好事，也必须是“在阶级斗争风口浪尖上的好人好事”，不然也是“无冲突论”。这样一来，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只有“捉坏人”、“斗老师”之类的内容才能成立。其他儿童生活领域的题材，诸如学习雷锋精神、三好五爱、尊师爱生、遵守纪律、讲究礼貌等等道德品质方面的题材，没有一样能摆脱“无冲突论”的罪名，因此一概要排斥在儿童文学的大门之外。儿童文学的题材本来极其丰富，却被“四人帮”搞得如此枯竭。

道德品质教育，这是少年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与文学创作中的“无冲突论”毫不相干。并且，新道德、新风尚，本身就是针对旧道德、旧风尚而言；好人好事，本身就是针对坏人坏事而言，这用“无冲突论”来定性、定案，怎样能定得上呢？“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狂，以至如此。

“三突出”加上所谓写阶级斗争，在儿童文学中造成的结果，就象一首打油诗所说的那样：“人物形象高全大，情节结构模式化，老师个个成活靶，坏人好抓一大把。”

“四人帮”提出“触及时事”，“紧密配合形势”，是他们搞阴谋文艺的又一诡计。凡是他们要“触及”要“配合”的东西都成了“重大题材”，于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写“走资派”等所谓“重大题材”，充斥了儿童文学，不仅短篇小说、儿歌要配合，中长篇小说也要触及。不然，就给你戴上“脱离政治”的帽子。这样一来，可害苦了我们的小读者，就连幼儿园和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也得看《商鞅变法的故事》。什么叫“变法”？什么叫“新兴的地主阶级”，这些连不熟习历史知识的大人也弄不懂的东西，却硬要塞给十岁以下的儿童。孩子们只知道地主是坏人，但书里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却是英雄，这使他们大惑不解。他们向大人提出

许多问题，大人也只好报以苦笑了。试问，这种东西也能叫儿童文学作品吗？也算得上低幼儿童读物吗？

儿童文学的样式，也是极其丰富的，比如童话，顾名思义，就是专为孩子写的，也是儿童特别喜爱的一种文学形式。但是自从“四人帮”将许多童话、寓言、民间故事（包括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伊索的《龟兔赛跑》等）一棍子打成“毒草”之后，这些文学样式也就成了可畏的“禁区”。有的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之前，深有感触地说：“不搞寓言，决不会有人批评你犯了一个错误；搞了寓言，说不定哪年哪月，有人说你影射什么，攻击什么，那时候叫你有口说不清。”实际上，这是许多同志在“四人帮”横行时的亲身经验。

寓言的特点是，它通过一个简单的故事，讲明一个普遍的道理。即寓道理于故事中，对人们起着告诫、讽喻的作用。童话、民间故事也有这个特点。正因如此，它可以联系这件事，也可以联系那件事；可以联系这个人，也可以联系那个人。如果有人硬要瞎联系，任意上纲，其结果，就使作者和编辑大吃苦头。《龟兔赛跑》的骄傲使人落后的主题，难道还不明确吗？这是四、五岁的孩子在听了这个故事之后还能说得出来的。哪里知道天外飞来一顶“爬行主义”的帽子，将流传了二千多年的伊索的这一名篇打倒在地。在棍子、帽子满天飞的日子里，儿童文学的形式之单调贫乏，这就是不可避免的。

少年儿童处于长知识的阶段，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而又要使他们乐于接受，这就出现了科学和文艺相结合的科学文艺。这是儿童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品种，有科学诗，科学童话，科学幻想小说等等。前几年，这一品种同样惨遭浩劫。《十万个为什么》（以下简称《十万》）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说，向少年儿童介绍自然科学知识，这是一项重要任务。但是他们说，这是用知识冲击政治，是贩卖“知识就是力量”。

我们说，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专家能为孩子写书，这是好事情。但是他们说，这是彻头彻尾的专家路线，是拜倒在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脚下，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我们说，儿童读物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写得生动活泼，使孩子喜闻乐见。但是他们说：这是资产阶级的趣味性，越是反动的东西，越是写得生动，其危害越大。

至此，一套《十万》，成了十恶不赦的“大毒草”。

在这里，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当时是怎么批判的。例如，书中谈到盐卤的性质时，举例说：“电影《白毛女》里，贫农杨白劳被地主黄世仁逼得喝盐卤而自杀。”竟有人说：这篇文章是掩盖阶级矛盾，美化地主阶级；杨白劳明明是黄世仁逼死的，为什么说是盐卤毒死的？又如，书中谈到“炸药能摧毁山岩，叫大自然按照人类的意志改变面貌。”有人说：这是麻痹无产阶级革命斗志，炸药的最大功用，应是炸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还有书中谈到太阳黑子的知识，有人说：从太阳里找黑子，是影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书中介绍稗子和水稻杂交可育成千粒穗，有人说：这是敌我不分。书中提到：皮鞋为什么越擦越亮？有人说，这是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如此等等举不胜举。帽子千万顶，手法只有一个，就是硬把一些自然知识、自然现象和政治概念、政治是非胡扯在一起。有的荒诞得使人吃惊，有的幼稚得使人发笑，有的上纲上线令人毛骨悚然，有的牵强附会令人啼笑皆非。

可是，等到“四人帮”篡夺了宣传大权以后，他们也想拿点货色来装璜门面。因此“毒草”也有了修订的价值。被修订后的《十万》，首先在方针上把儿童读物变成工农兵读物。据说，不如此就不足以体现为工农兵服务。这样一来，《十万》的儿童特点没有了，一些生动有趣的内容去掉了。说这就避免了“资产阶级趣味性”。科学家的名字被抹去了，说这就克服了“崇拜洋人”的思想。那么科学成果到底出自何人之手呢？答曰：“人们”、“有人”、“科技工作者”。连“科学家”三个字也不提。因为一提到科学家，就是提倡“成名成家”、“走白专道路”。不应该去掉的去掉了，不应该加上的却加上了。一套自然科学丛书，竟塞进了一些“儒法斗争”、“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等等穿靴戴帽、帮风帮气的东西。一套《十万》，被按照“四人帮”的面貌修订得面目可憎。

至于给低幼儿童看的自然知识读物，被“四人帮”摧残得更加不成样子，作者怕写，编辑怕编，怕的是“智育第一”的大棒。我们祖国的后一代，自幼就被“四人帮”剥夺了学习自然科学的权利。

二

“四人帮”破坏儿童读物的目的，不仅为了取消儿童读物，更重要的是为了把儿童读物纳入他们篡党夺权的轨道，使儿童读物为其反革命政治阴谋服务。

一九七四年，“四人帮”为了攻击周总理，制造了风庆轮事件，演出了一出所谓批判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丑剧。一时之间，以试航、远航为题材的作品纷纷出笼。单是上海出版的少儿读物，涉及到的就有近十种。

一九七五年，在“四人帮”掀起的批判所谓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时，中篇小说《金色的朝晖》出笼了，它以批判一九七二年的所谓教育战线“黑线回潮”为背景，捏造了一个“角刺兼备”的少年形象，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抓学习质量和学工的矛盾，硬给一个兢兢业业搞好教育工作的教师扣上“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等大帽子。这部小说写得并不高明，却被“四人帮”看中了。帮刊《朝霞》还发表文章加以吹捧，叛徒江青亲自下令要把它搬上银幕，妄图与《园丁之歌》唱对台戏。

“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成为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以后，他们在上海的余党一再下令儿童文学也要写“大走资派”。儿童文学怎么写“大走资派”呢？怎么写少年儿童与“大走资派”斗呢？他们叫嚷：“只要搞出来，不是儿童文学也不要紧。”“不要考虑什么儿童特点，作为政治任务去完成。”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搞的是阴谋文艺。

长篇小说《钟声》是和《金色的朝晖》同一题材，同一主题，吹捧张铁生式的小丑，攻击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的一部长篇小说。为了“紧密配合形势”，在付型前还动了一次大手术：把原稿中一个犯

“路线错误”的新干部，改成老干部，把虚写的支持“错误路线”的区教育局负责人，改为实写的“还在走的走资派”。这一改，“四人帮”满意了，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加以吹捧。不料它出笼仅仅四个多月，“四人帮”就被华主席一举粉碎了。

凡是为帮所用的作品，他们就千方百计让它出笼；相反，凡是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不利的作品，就要加罪名大砍大杀，没有成书的，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一九七六年二月，在周总理逝世后的悲痛日子里，《上海少年》刊登了《周总理在少年宫》的纪念文章，触犯了“四人帮”的禁忌，使得“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大为恼火。他们要公开问罪吧，又张不开口；不问罪吧，又不甘心，于是说什么：“今后刊物配合形势，要从大的方面配合；不要一时一事搞配合。”什么“一时一事”？什么是“大的方面”？这就不言而喻了。

一九七五年出版社曾组织作者创作一本以长征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远征》。凡是提到长征的作品，“四人帮”无不恨之入骨。因为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极大障碍。他们胡说：“要出版这个集子是为老家伙评功摆好”。三令五申硬逼着作者中途停笔。直到“四人帮”粉碎之后，这个集子才和广大小读者见了面。从上面所举的两个例子，可以见到“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为祸之烈。

三

“四人帮”横行十年之久，流毒之深，影响之广，非一般可比。他们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把许多是非界限搞混了，因此，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就不能不是一场艰巨的斗争。这里只就儿童文学特点的问题和儿童文学如何配合形势的问题，谈一点意见。

儿童文学的读者对象是少年儿童，当然要有自己的特点，不仅如此，给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阅读的作品，还应各自有其特点。谁也不会将少年们读得津津有味的小说拿给幼儿园小朋友去读，也

不会将幼儿园小朋友唱得朗朗上口的儿歌拿给少年们去唱，特点就是矛盾的特殊性，事物之所以千差万别，就因为它们各具特殊性。可是“四人帮”竟然抹煞儿童文学的特点，他们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对立起来，胡说讲了儿童文学特点，就是否认文艺的普遍规律和共同原则，就是鼓吹“儿童文学特殊论”。在他们的控制下，居然出现这样的怪现象，“成人文学”写什么，儿童文学也写什么；“成人文学”怎么写，儿童文学也怎么写。他们正是利用抹煞儿童文学特点，使儿童文学为帮所用的。

取消儿童文学特点，也就否定了儿童文学。前些年，一些被称为“儿童文艺读物”的读物，不得不打上标记，以此有别于一般的文学读物。可惜，这是徒劳的。孩子不要看，也看不懂，大人也不承认它们是儿童文艺读物。因此，尽管书店里摆着不少这类“儿童文艺读物”，而孩子们却苦于无书可看。

毛主席曾经反复告诫我们，做工作要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尖锐地批判那种“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的做法。指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正因为如此，我们强调儿童文学必须具有特点，也就是要求儿童文学创作在选择题材、确定内容、表现形式、以及文学语言等方面，尊重孩子的年龄差别、阅读能力、理解水平以及他们的兴趣爱好、欣赏习惯等实际情况。这有什么不好？这有什么不可？又何罪之有？

前面说到的“三突出”、所谓“写阶级斗争”、“触及时事”、“配合形势”等等，象一条条绳索，将儿童文学捆得死死的，使它失去自己的特点。至于“写大走资派”的阴谋文学，自然更是“不要考虑儿童特点，作为政治任务去完成”就行了。一九七六年六一儿童节前，上海准备举办一个儿童电影汇映，“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说：“什么叫儿童电影？是不是以儿童为主角的电影才叫儿童电影？《春苗》算不算？《难忘的战斗》算不算？如果不算，与童心论又怎么区别？”按照“四人帮”的逻辑：儿童电影和一般电影没有区别，儿童文

学作品和一般文学作品自然也没有区别。你不服？你就是“童心论”，你就是以儿童特点来“排斥重大题材”，“排斥工农兵形象进入儿童文学领域”。

一个是“重大题材”，一个是“工农兵形象”，被“四人帮”说成是与儿童文学特点水火不相容。这是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强调儿童文学特点，并不排斥重大题材；但是，这些重大题材，必须经过选择的，起码应该使儿童有兴趣，能看懂，从而可以从中受到教育。不然的话，即使是再重大的重大题材，硬塞给儿童，那只能是对牛弹琴”。同样，强调儿童文学特点，并不排斥工农兵形象。在十七年中就有相当多的儿童文学作品是写工农兵英雄的。否定这些作品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俨然以工农兵的“代表”自居的“四人帮”。即使在反映儿童生活的作品中，大多也写到工农兵的。因为天下并没有什么与世隔绝的“儿童世界”，儿童生活在成人之中，首先，他们的父母大多就是工农兵。他们的成长更离不开工农兵和其他成人的教育和影响。

趣味性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特点。“四人帮”将趣味性和低级趣味、资产阶级趣味混为一谈，使得一些同志至今忌讳“趣味”二字，凡是本来应写“趣味”二字的，一概以“生动”二字代之。我们所说的儿童文学的趣味性，指的是生动、活泼、形象、幽默、有吸引力。这是任何文章都需要的，写给孩子看的则更需要。如果有人能把深奥的理论和高深的知识，生动有趣地讲出来，使人能听懂，愿意听，而不至于打瞌睡，这本是一种艺术，一种本领。可惜这不是人人能做到的。而“四人帮”却硬把趣味性奉送给资产阶级，似乎无产阶级需要的是枯燥无味。真是无知之极。

儿童文学必须具有自己的特点，没有儿童文学特点，就不是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要不要政治挂帅和配合形势，这本来也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怎样叫政治挂帅，怎样叫配合形势，却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也曾被“四人帮”搞得糊里糊涂。

在“四人帮”看来，搞“阴谋文艺”和“影射史学”，这叫“政治挂帅”、“配合形势”；在文章中穿靴戴帽，搞些帮风帮气、帮言帮语的东西，也叫“政治挂帅”和“配合形势”。这些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东西，现在虽然被人们识破了，但不等于解决了我们的认识问题。

有人认为，在书稿中多引用革命导师的语录就叫政治挂帅。这在作者中也是比较习惯的。结果出现了许多引用不当的事例。有一位医生，发现了一篇科学幻想小说中引用毛主席语录，指出：“绝不可把毛主席语录用于虚无缥缈的幻想之中。”这是既恳切又负责的意见，硬把现实生活中没有实现的幻想，说成是根据毛主席某一条语录实现了，这不叫政治挂帅，这叫政治上的不严肃。但我们有些同志至今心有余悸，遇到引用语录不当的事情，连删也不敢删，宁肯另抄一张，生怕被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其实把引用不当之处删掉，这是既防止了政治错误，又卫护了毛泽东思想。

有人认为，在科学文艺作品中加些政治词句和政治口号，就叫政治挂帅，就叫配合形势。岂知这是“四人帮”形而上学和恶劣文风的余毒。它只会使文章不伦不类、不三不四，不会有好作用。其实，我们如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到把科学知识生动活泼地介绍给孩子，使他们从小就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学习本领，这本身就是政治挂帅，也是配合了形势。

不破不立。“四人帮”的一套歪理邪说，必须彻底批判；“四人帮”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彻底砸烂；被“四人帮”否定的那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必须恢复；“四人帮”给我们的那些惨痛的教训，必须总结。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坏事变成了好事。现在我们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就可以将儿童文学创作推上去。华主席和党中央对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儿童读物的关怀，给我们的工作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对我们的思想也有很大的鼓舞和促进。让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上，精神振奋、信心百倍地投入战斗。春风送暖百花开，万紫千红放异彩。儿童文学的百花园里，一定会繁花似锦，为我们伟大祖国的春天，增添一分光彩！

童话创作面临着重大的历史任务

——《童话选》序

贺 宜

上海教育出版社编选了一本《童话选》。自“五四”以来各个时期的童话创作，如此丰富多采地介绍给读者还是第一次。我有机会预先读到了其中大部分的作品，感到很高兴。这本集子的出版是对“四人帮”摧残童话创作罪行的有力批判，更是进一步繁荣儿童文学创作的有力促进。

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不但新创作的童话绝迹，就是世界著名的优秀作品也被贬入了冷宫，弄得孩子们甚至不懂得什么叫童话。

其实童话历来是最为孩子们喜爱的文艺作品的一种。童话这一名称，是“五四”以后才从日本引进的，实际上，自有人类文明以来，童话就有了。它是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的一部分。——故事、传说、神话等等口头文学中有很多是成年人讲给儿孙辈听的，它们就是童话，就是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流传的民间童话。它们经过代代相传，人们又按照自己的想象和需要而加以补充、改造和发展。待至后世，文学家们又根据这些材料整理和创作为作品，这就是用文学形式出现的最初的童话创作。后来就发展而为儿童文学的一种重要样式，为广大少年儿童所喜爱。

童话有丰富的幻想，强烈的夸张和饶有兴趣的故事，非常适合孩子们好奇和富有想象力的特点，对于培养和启发儿童的想象力很有用处。给孩子们讲一个道理，使他们容易理解和乐于接受，要

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十分简易的。如果把一个道理用童话形式来讲给孩子们听，他们觉得很形象、很新鲜、很有趣，易于接受和理解，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是不难找到的。譬如说大家所熟知的拔萝卜的故事，小兔子拔萝卜拔不动，后来小狗、小猫等等都来帮忙，大伙就把大萝卜拔起来了。有时讲很多道理来跟娃娃们说明集体的力量大，也不一定就比这个拔萝卜的故事更为他们所喜爱，一听就明白其中的寓意。讲的虽然只是小兔子们的事，却能启发儿童联想到生活中的道理，生活中也常常能碰到类似的事情。至于那种比较复杂和更有情节的童话，对孩子们的吸引力那就更大了。所以千百年来，童话成为孩子们喜爱的一种文学品种，决不是偶然的。

“四人帮”把童话从儿童文学的领域中驱逐出境，诬蔑它“宣传迷信”，“诱使儿童脱离现实”，“胡思乱想”。宣传迷信，诱使儿童脱离现实，胡思乱想的童话有没有呢？有的。在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这样的坏童话是很多的。在解放以后，这样的坏童话就少得多了，不过也不是没有。即使在今后，出现这样的坏童话也并不是不可能的。要知道，宣传迷信和诱使读者逃避现实斗争，并不是童话本身的罪过，这只能是作者的责任。一切文艺作品在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作家的笔下，都可以成为宣传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的工具。反过来，在进步作家的笔底下，它们却可以成为宣传正确的思想和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的战斗武器。小说也好，散文也好，诗歌也好，戏剧也好，没有例外。童话不过是一种艺术形式，决定它是进步还是反动，是有益还是有害，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这是谁都明白的。鸟言兽语和拟人化，都不过是艺术手法，而不是作品的内容。“四人帮”用童话中有时出现鸟言兽语或者一些拟人化的形象作为扼杀童话的借口，根本不问内容。这是“四人帮”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的又一明证。

童话的形象在一切文艺作品中最为自由和广泛。上至日月星辰，霜风雨雪，下至鸟兽虫鱼，花草木石，以及不论有生命还是无生命，有形还是无形，具体的物质还是抽象的概念，都可以通过人格化，作为有思想、有语言、有行为、有性格的人物出现在童话中，这

就是童话的一个特点。拟人化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在其他文艺作品中也有运用的，不过不象童话那样运用得普遍罢了。

童话的这种形象，实际并不是写物，而是写人，写人间，写生活。

有生命的东西诸如鸟兽虫鱼，花草树木，作为人物在童话中活动，这是大家所习见的，这就是一般所谓“鸟言兽语”。至于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象风霜雨雪，日月星辰，山川土石等等自然界事物和人类劳动生产的成品，在童话中被赋予了生命也不是罕见的现象。例如在本书中，严文井同志《小溪流之歌》中的小溪流和《四季的风》中的风等，是自然界的事物；叶圣陶同志的《稻草人》中的稻草人和《古代英雄的石像》中的石像，则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它们本来都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在童话中，它们都成了一个有生命的存在。

有时还有把抽象的概念或思想予以人格化而成的形象，如本书《财神下降以后》那篇童话中的财神就是私有制的人格化。郭沫若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写的童话《一只手》，其中的那个叫克培的人物（K. P. 是德文共产党的缩写），就是“共产党”的人格化。这种人格化的概念，在童话中也是常见的。

除此之外，童话中的人物更多的还该是人，古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的人。或者在一个童话作品中既出现普通的人，又有超自然的人物或拟人化的各种生物。即使是写普通人，童话跟小说相比，它的人物的语言、性格、行动和经历有更多的夸张和浪漫色彩。前者象《活矿工和死把头》、《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后者象《狐狸打猎人的故事》、《雪夜奇遇》等。有人把“鸟言兽语”作为童话的主要形式，这显然是一种偏狭的理解。至于“四人帮”借口鸟言兽语荒诞不经，歪曲现实，脱离生活，而排斥童话，那更是荒唐可笑了。

童话，不管它是哪一种形式的童话，都不能离开生活。离开了生活，就没有了童话的生命，失去了童话的魅力。有的人以为童话的魅力是靠丰富的想象获得的。其实，丰富的想象如果不是植根